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每当新春佳节，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处处是耀眼的中国红，红色灯笼、红色对联、红色梅花、红色茶花……映照看祖国的大好山川，映红着人们的幸福脸膛。此情此景，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倍添喜庆气氛，也使人们在浓浓的年味中，尽情体会中国文化的魅力。

千百年来，中国红是中华民族欢度春节的主色调。中国红，是三原色中的大红，一种鲜艳的颜色，是太阳的颜色，是血的颜色，是火的颜色。中华民族视红色为平安、吉祥、喜庆、尊贵、热烈的象征，寄寓百事顺遂、逢凶化吉的心愿，绵延地传递恒久的喜庆气息。红色吉祥，红色辟邪，这种观念早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。唐代时，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。为“驱邪”和躲避瘟疫，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用屠苏草或几种草药泡的屠苏酒，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，挂在门框上。

清代顾轮在《鹊踏枝》词中这样写道：“昨夜春声喧爆竹，郁垒门边，红出斜幅。腊味登盘尝已足，檐前更挂风猪肉。”词中点出了过年时就有红色的春联。清康熙年间，通用红色硬纸制作的贺年片，因为红色有喜庆、吉祥之意，清人称之为“红单”。这象征吉祥的红色，氤氲着古色丰香的秦汉气息，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脉络，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遗风，流转着独领风骚的元明清神韵。

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喜庆吉祥的中国红，不仅闪耀华夏大地，也映衬在历代诗人吟咏春节的诗句中。唐太宗李世民在《守岁》诗中写道：“阶馥舒梅素，盘花卷烛红。”大红烛点燃了，烛花盘绕，喜气洋洋。唐代杨巨源的“一片彩霞迎曙日，万条红烛动春天”，将万道霞光比作万条红烛来赞美新春佳节，何等壮观。宋代姜夔《鹧鸪天·丁巳元日》诗云：“柏绿椒红事事新，隔篱灯影贺年人。”宋代席振起在《守岁》中写道：“相邀守岁阿咸家，蜡炬传红映碧纱。三十六句都浪过，偏从此夜惜年华。”元代诗人赵孟頫在《岁月》中写出了家家爆竹、户户焰火的景象：“柳絮飞家铺地白，桃花落地落阶红。纷纷灿烂如星陨，霍霍喧喧似火攻。”

宋朝诗人舒岳祥在《同正仲赋赧桐彩缬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徘徊最爱真红色，摇曳偏垂五彩裳。”红色系是中国传统“五正色”之一。红色色彩词众多，单一的就有赤、丹、炎、彤、朱、纁、红等。《尔雅·释器》中讲染红色，一染纁（quán），再染赭（chěng），三染纁（xūn），即一染橙色系，再染就红一点，再染更红了，第四次染，就叫绛。“染小红，以练物帛十两为率。苏木四两，黄丹一两，槐花一两炒香研末，明矾一两为细末。”元朝的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中记载的这份唯美的染料配方，勾勒出了浅云般的雅致色调，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常用的浅红色染料色。

中国古代绘画大多使用天然矿物质颜料，比如朱砂。朱砂又名辰砂、丹砂、赤丹、汞沙。古代把它作为炼丹的重要原料，过去以产在辰州（今湖南沅陵等地）的品质最佳。它的晶体表面具条痕红色，半透明；纯净的朱砂为金刚光泽，呈朱红色；含杂质时光泽暗灰，呈褐红色。我国利用辰砂做颜料有悠久的历史，几千年前就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，古代帝王也常用朱砂的红色粉末书写批文，即所谓“朱笔”。在朱砂中加入不同的原料调制，其色泽也各不相同。经研磨、漂洗、沉淀等工序，将朱砂细末与艾丝、油等调制，就制得了朱膘。朱膘质细、色淡，略现红黄色，细腻典雅，常用于古建筑彩画中的山水、人物、花卉等写生画的点缀部分，也是印章印泥的原料。

和天然矿物制成的朱砂不同，银朱是一种传统的人造颜料，由硫黄同汞升炼而成，呈亮丽的朱红色。银朱被大量用于壁画、墙绘等，也可用于制作防虫蛀的丹纸、印泥、室内涂料、生漆等。土红，又称西红、铁朱、铁红，为泥土和矿物质的混合颜料，因为天然的土红中常混有黏土，也叫红土。土红因为所含杂质不同，呈现为黄红到棕红的不同色调。在敦煌的莫高窟壁画中，就大量使用了本地出产的土红颜料。

红珊瑚是红珊瑚虫的分泌物石化后的形态，颜色从桃红到深红皆有，制成颜料后，因红色相对较淡，常用于绘制人物的衣服和皮肤，在唐卡和壁画中都有广泛应用。由于红珊瑚生长缓慢且对环境要求很高，受到环境变化和过量采挖的影响，已经被列入自然保护名录，擅自采挖、买卖红珊瑚很可能会触犯相关法律。

至于古代常说的“胭脂”，使用红蓝花汁制成，属于植物颜料的一种。后来，胭脂虫制颜料的做法也传入我国，胭脂虫是一种寄生在仙人掌上的昆虫，从它身体里可以提炼出粉红色颜料，这种颜料因为最初来自国外，被称作“洋红”。后来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化学方法生产的颜料开始占据主流，“洋红”逐渐变成了专指这种粉红色的名词。现在，由胭脂虫提炼的色素，因其色彩鲜艳、无毒无害的特点，被广泛应用于食品、化妆品领域。

春节离不开红。丰子恺在《过年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吃饭时母亲分送压岁钱，我记得是四角，用红纸包好。”吃完年夜饭，长辈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，红包象征好运，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。春节早晨，开门大吉，先放爆竹，也叫“开门炮仗”，爆竹声后，碎红满地，灿若云锦，称为“满堂红”，满屋福气，喜气洋洋。侗族同胞过春节时，姑娘们的头一件大事就是邀集女伴到山上去采摘如火如荼的映山红。浙江温州人吃年夜饭时，席上会用十只朱砂高脚红碗，盛着十样冷盘，叫“十全”。每碗须有一块切成薄片的圆形红萝卜头盖在顶端，以讨个吉利。

“欢庆新年笑语哗，红岩土岁赠梅花。举杯互敬屠苏酒，散席分尝胜利茶。”在这次度中国年的美好时光，喜庆热烈的中国红带给人们无限的希冀和美好。

阅评

“糖瓜祭灶，新年来到。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，老婆子要吃新年糕，老头子要戴新呢帽。”这首流传于北方地区的年节歌谣，生动地传递了旧时民众盼望新年的热切心情。

尽管现在“天天吃好的，天天过大年”，尽管现在限制放鞭炮，年夜饭有时都跑到饭馆去吃，但物质生活的丰富始终没有改变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。“一年不赶，赶三十晚”，每年春运期间返乡过年的汹涌人潮，12306上抢不到火车票时的焦虑，都反衬出了春节对大家的意义。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knots，对于不能回家过春节的人来说，总有一种漂泊的失落感，总感觉新年开头开得不带劲儿。

民俗学博士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《春节》一书结合简明的史志文献与生动鲜活的地方民俗调查报告，系统梳理了春节传统民俗：从节俗起源、典故、诗文、到节俗活动及其文化内涵，沿着春节的时间进程，对各项节俗逐次展开叙述，主要包括腊八、祭灶、扫尘、年节食品筹备、洗浴、装饰门庭、团年、守岁、压岁钱、爆竹迎年、拜天地祖先、拜年、贺年、送穷与祭财神、人生日、迎春、闹元宵等。大家在品味着浓浓的年味的同时，亦会清晰地看到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。

老北京人过年的时候要吃荸荠，谐音“必齐”，说的是亲人要新年团聚，没有回来也要摆上一双碗筷。在许多地方，年夜饭的餐桌上必定有鱼、肉做成的丸子以及其他象征团圆安康的菜肴。年夜饭的背后，是亲情与相聚，是交流与感激。平时吃得再好，也没有年夜饭吃得有滋味。正是这些年夜饭、压岁钱、贴春联、放鞭炮、舞龙灯、走亲戚、逛庙会、闹元宵等等的新春仪式，营造了过年的喜庆气氛，增加了亲人朋友间的凝聚力 and 认同感。在欢乐和传递欢乐的过程中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强化与更新。

学者张能为先生在《经验“节日”，更好地理解和创造存在》一文中说，“节日就是共同性”，并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它的充满形式中的表现；节日还是人的交往活动中的意义交流、情感共享，让人们在共同体中理解个体存在以消除隔离性，并不断反复地去寻求节日表征蕴含的历史的、民族的、文化的关于世界存在的普遍性意义理解和解释。

《春节》先是讲述了春节在历史上的源流，认为其可以溯及上古年终岁首的年终祭祀，其中体现了古人对神秘自然节的礼敬。秦汉以后，作为岁首的春节，其社会意义更为明显，朝廷以此展示和加强君臣之义，民间则作为乡里聚会之良辰——后世春节的基本形式可谓已基本形成。至汉代，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，此后历法虽几经修改，但正月

影评

时至今日，著名导演黄健中的电影《过年》，依然是一部经典。

一年一度的农历春节来临，生活在东北农村的程家老两口（李保田与赵丽蓉饰）满心欢喜地等待儿女回家过年。去年的团圆饭不欢而散，因此母亲更加盼望这次能过个愉快的团年。不久，子女们陆续回来：长子（六小龄童饰）木讷老实，大媳妇（丁嘉丽饰）泼辣刁蛮；干部大姐夫（葛优饰）不走正道，在外拈花惹草，还强逼妻子堕胎；小儿子（梁天饰）不务正业，贪图享乐，只知道伸手要钱；父亲最疼爱的二女儿当初叛逆父命嫁给架子工（中军谊饰），如今自食其力干出事业的小两口也再次归来。看似喜庆祥和的兄弟妯娌们却各有各的小九九，不知今年的年夜饭该如何收场……

影片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初，在经历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后，向钱看向权看的不良社会氛围。钱与权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杆，也成为各种话题的中心，凸显着物质文明发展背后精神文明的贫瘠，人人都被刺激着向着钱权争先恐后地赛跑，却缺少了一根道德的准绳。另外，这部影片更多地讽刺了过年所包含的遗风陋俗。亲情的交流变成了金钱互换式钩心斗角的游戏，养儿防老观念的不合时宜以及内在苦累、婆媳关系、翁婿关系的物质化，兄弟姐妹们交流中的虚情假意与尔虞我诈，以及夫妻间因过年而产生的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说到底，一到过年，老人们是最辛苦的，也是最无奈

寒随一夜去 春逐五更来

横舟



清代画家姚文瀚的《岁朝欢庆图》

岁首就此固定下来。此后历经发展，年俗越发丰富。宋以后，新年称为“元日”或“元旦”，王安石的《元日》一诗就描绘了新年场景，其中放爆竹、贴春联等与今日大体相同。明清时期，如今我们熟悉的一套年俗臻于定型。像穿新衣、祭神祭祖，出门拜年，品尝美食等等，尤重除夕、新年和元宵。

春节与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并称为我国汉族四大传统节日。除旧迎新的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，起源于殷商时期年终岁首农作物丰收祭神祭祖的庆祝活动。譬如，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就记载了周代人禾谷登场后，凿冰藏鱼，涂扫场地，设朋酒以饗宴，杀羔羊以为肴，捧美酒登公堂的人春祭祖歌。“二之日凿冰冲冲，三之日纳于凌阴。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。九月肃霜，十月涤场。朋酒斯飨，曰杀羔羊。跻彼公堂，称彼兕觥，万寿无疆。”

“年”本义指农作物的丰收。甲骨文中的“年”字，是人背禾的形象字，指收成。甲骨卜辞中常有“受年”“受黍年”“求年”等。《说文》云：“年，谷熟也。”在农作物丰收之后，人们要举行庆祝活动，祭祀神灵，感谢赐

予，并祈求来年的丰收。由于当时禾谷一年熟，人们自然将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。商代并不特别看重禾谷成熟周期，而周代以农业为立国的基础，农业丰收是王朝大事，因此以禾谷收获期作为年度时间名称。以农作物生长、成熟为时间段落标



《春节》封面

过年，一次打扫忧伤之旅

梅琳

的，却又是最渴望欢乐的。对过年的理解，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有着代沟，其中有时代的变迁与外来文化涌入的原因，更多的是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导致沟通的减少与意识不到的隔阂。

余世存在《节日之书》中说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。一元复始。万象更新。普天同庆。爆竹声里一岁除，且把新桃换旧符。除了这些套辞外，我们还知道什么？”如果你熟悉中国式大家庭的生态景象，你就会理解电影《过年》真实到戳心的程度。从编剧、导演再到演员，电影非常精准地抓住了那个年代大家庭的特质，每一个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，完美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。电影中的这个家庭，不仅局限于农村，也是中国万千家庭的缩影。中国家庭的次序、伦理、家庭成员的关系剪不断却又嫌隙丛生，相互依赖着，也相互打压着，构成了一幅尽显戏谑与批判底色的浮世绘。

2024年春节是农历新年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的第一个春节。法新社、路透社均关注到，2024年春运是中国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第一个常态化春运。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春运，40天内大概有90亿人次出游、探亲、休闲。路透社向读者描摹了这样一幅画面：在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假期前夕，中国进入了“高速运转状态”，旅客们登上火车和飞机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家人们则准备传统团圆饭迎接，大家都“期待看家乡的味道”。法新社写道：“列



电影《过年》海报

车上的空气中，弥漫着方便面散发出的香味；车厢内的窗边，乘客们怀着期待的心情，眺望归途中的乡土风光。”

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，春节最大的主题，就是回家。

赵丽蓉扮演的母亲形象犹如地母般宽厚慈爱，她出生在旧中国，比老公大八岁，应该是童养媳。她对生活的苦难照单全收，毫无怨言。大儿媳算计她的金戒指，她说戒指是土改时分的一幅面：在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假期前夕，中国进入了“高速运转状态”，旅客们登上火车和飞机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家人们则准备传统团圆饭迎接，大家都“期待看家乡的味道”。法新社写道：“列

志是原始先民的习惯，它在一些后进民族中保存了很久。大年、新年由周代确定之后，成为中国人最向往的日子。

汉武帝太初元年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，年节由此固定下来。“年是农业社会的时间标志，体现着农人的生活节律。上古春节的岁时活动主要就是祭祀诸神与祈求谷物丰收。年终大祭是岁末对天地人间诸神的一次总结性的隆重祭祀。”

秦汉以后，春节成为朝廷加强君臣之义的契机，民间则作为乡里家庭聚会、拜贺宗亲乡党、拜谒亲族邻里、走亲访友的民俗大年。唐代时，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是通宵观灯游赏的法定节假日。春节在宋元明清时被称为元日、元旦或新年，依然盛行岁首朝会大礼之仪。重农抑商的明朝特别重视与农事相关的立春节仪，以立春仪式替代朝会之仪。

明代北京立春时节要举行盛大的迎春、鞭春仪式。仪式由官府主持。东直门外设有春场，场内有春亭。每年先春一日，大京兆迎春，旗帜前导，次田家乐，次芒神亭，次春牛台，次正佐、耆老、学师儒，府衙上下皆骑马，只有县丞府尹坐轿，官员一律着红色衣服，簪花迎春。将春牛由春场迎入府内。这天，塑小春牛芒神，送入宫中，依次进呈上春、中官春、皇子春。然后，百官朝贺。立春当日，府县官吏，各穿官服，礼句芒神，用彩色的鞭子鞭打春牛三次，以示劝农之意。立春日，北京人无论贵贱都嚼萝卜，称为“咬春”，民间互相请客宴会。

《春节》是一部为国人量身打造的传统节日知识读本，将与春节有关的知识详尽解读，单单一节吃饺子，就让人大开眼界。饺子在中国起源很早，被认为是从馄饨中分化出来的节日食品。馄饨是中国古代冬至年节的节令食品，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后，冬至的节令也就迁移过来了，作为岁首的应时食品。因此，饺子是时间变化的象征之物。在民俗的观念中，新旧年度的时间交替在午夜子时，也就是晚上零点前后，即除夕与新年交替之际，全家吃饺子以应“更岁交子”的时间交点，表示辞旧迎新。加上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，一盆盆上桌，有“新年大发财，元宝滚进来”的象征意义。所以，饺子煮破了不能说“破了”“烂了”，要说“挣了”“涨了”……

民国肇造，引入西洋历法，采取公历纪年，而民间仍惯用旧历。民国政府将传统“元旦”的名称用于公历首日（1月1日），而将传统岁首更名为“春节”。因此今天的“春节”名称虽只有百余年历史，其实这一节日已经传承了几千年，可谓源远流长。“今岁青霄尽，明年明日色。寒随一夜去，春逐五更来。气候空相转，容颜暗里回。风光人不觉，已著后园梅。”传承节日文化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，如何使节日焕发生机，

或许是我们面向未来更应该思考的。

什么是节日？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，节日就是庆祝，就是人们打破日常状态进入共同欢聚的日子，“节日是把一切人联合起来的東西”，节日“距离的同一”促进了社会公共交往。自古以来，要形成共同意义的生活，所有集中都是必需的，而在现代日常生活中，人们为了各种目的忙碌，不得不分散成单独的隔离性的人。要打破此种隔绝性的存在状态，重返具有共同性的共在世界，节日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存在经验形式。“节日和庆祝显然不是拆散人们，而是聚拢人们”，节日是一种交往活动，在庆祝节日时人们聚集在一起。因此，节日是“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”，是“重新建立所有人的相互交往的契机”。

节日来源于季节的变化，生机勃勃，也休养生息。伯特兰·罗素在《幸福之路》中说：“我们都是自然之子，我们的生活是自然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从自然里汲取养分，与动物、植物并无二致。自然的生活节律是舒缓的，对它来说，秋、冬与春、夏同样必要，休息与运动同样重要。相较于成年人，孩子更需要与自然生活的涨落节律保持联系。……我曾见过一个生长在伦敦的两岁男孩，第一次被带到绿色的乡间散步时的样子。时值冬日，一切都是潮湿而泥泞的，在成人眼里没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，可男孩在这里却表现出了神奇的狂喜，他跪在潮湿的地上，把脸埋进草里，发出含混不清的欢乐的叫声。他的幸福体验是原始的、单纯的，也是巨大的。他的这种正在被满足的生命需要意义深远，假如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，人很少能成为完善健全的人。”

哲学家米哈伊尔·巴赫金说，节日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生活的空间——自由、平等、富足。在过节的时候，阶层、收入、年龄等等隔阂都被弱化了，大家相对平等地享受着节日氛围。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，我们彼此祝福、表达善意，人的孤独感也会随之减少。

电影《小王子》中，小王子驯养了一只所爱的狐狸，两人对于仪式感的理解颇为触动人心。小王子在驯养狐狸后的第二天去看望它，狐狸说：“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来，比如这样说，你下午四点钟来，那么从三点钟起，我就开始感到幸福。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感到幸福。到了四点钟的时候，我就会坐立不安；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。但是，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，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……应当有一定的仪式。”没有仪式感的探望，幸福感会大打折扣。

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中华民族传承了两千多年，人们将许多的感情、愿望、伦理、信仰都积聚在这一节日上。春节已经不是简单的时间点，它被人们充分价值化。春节不仅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资源。“虽然我们常用‘吾心安处即家乡’来安慰自己，但故乡的春节还是我们舍不得的心结。我们期待冬天的雾霾及早消散，春天的百花快快盛开。”

影。中国式的亲友关系非常微妙，或亲或疏，生活的智慧处处皆是，调和好一大家子并不简单。现在的团圆饭桌上，大家和和气气热热闹闹，貌合神离的并不少。上一辈宽厚的情性现在似乎很少被下一辈继承，因为一个“钱”字就能翻脸，在老人们看来不可理喻的表现如今在某些家庭却是常态。我们身处其中，我们平静接纳它的同时，不要忘了我们应有的生活姿态。再过二十三十年，这部电影也许更老了，但它说的人性和性，是不老的。

余世存先生说：“年在我们的民间传说里是一头凶狠的怪兽，驱邪避害是我们过年的要义。这也跟信仰情怀有关。……我想，对于年关，如果我们自习俗、传统、言行里经过审慎的分析诠释和概念重构，将会发现我们的‘日用’一定跟现代文明理性对生命的理解一致，我相信我们文明的习俗的核心也是对生命的至上尊重、生生之为大德，一定是体现在日常履践里。唐逸先生说过，在自家文化传统中，发现这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，只有惊喜与感恩。”节日不仅是为了纪念，为了生活的仪式，也是为了认同和表达。

“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，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。”影片结尾，一场尖锐激烈的家庭矛盾冲突归于平息，当我们还沉浸在悲剧体验之中时，人物的情绪节奏出现了新的变化：一切烦人的争吵声、摔打声、哭闹声消隐了，场景转到一片宁静的白桦林，朝阳暖暖地投下光辉，白雪在阳光下亮晶晶地闪耀；程老汉和老伴驾着马车在林海雪原上飞奔，马铃声清脆悦耳，音乐轻快活潑，程老汉一向锁着的眉头此时完全舒展开来，脸上竟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的笑容。这一变化使影片的情绪基调昂扬起来，使人终于感受到了过年的意味。